

当代文论丛书

当代文学思潮论

丁振海 著



DANG DAI WEN
XUE SI CHAO LUN

漓江出版社



当代文论丛书

当代文学思潮论

丁振海 著

漓江出版社

• 当代文论丛书 •
当代文学思潮论
丁振海 著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州红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0 插页3 字数233,000

1989年3月第1版 1989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7-5407-0504-3/I·376

定价: 3.70元



简 历

丁振海，1941年生，河北石家庄市人。196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此后曾在马列主义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红旗》杂志社等单位工作，现为《求是》杂志社编审、文教部主任。主要著作有与人合撰的《红楼梦主题论》、《红楼梦人物论》、《毛泽东文艺思想新论》等。

目 录

为什么人的问题依然是根本问题	(1)
“为人民大众的根本原则”也是文艺批评的根本标准	(12)
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指导创作	(25)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文艺创作	(35)
生活源泉和作家头脑	(46)
能动性在文艺创造中	(51)
毛泽东文艺思想作为体系及其发展	(59)
党领导文艺的光辉范例	(68)
正确开展文艺领域的两条战线斗争	(77)
当前文艺创作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88)
恩格斯的道德学说与文艺创作	(95)
文艺创作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113)
生活的真实与理想的光辉	(124)
文学创作如何反映生活本质	(129)
也谈当前创作中的性描写	(136)
文学与时代漫议	(141)
近年来文艺理论研究和创作态势一瞥	(161)

略论近年来关于文艺规律的若干探讨	(172)
对当前文艺规律研究的几点思考	(188)
艺术生产中的两种价值和文艺管理方式的变革	(197)
艺术生产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222)
谈《红楼梦》研究中的方法问题	(235)
也谈“文革”中的“评红热”	(250)
关于贾宝玉评论中的几个问题	(261)
《水浒》研究三十年简评	(284)
试论《水浒》情节、人物的提炼和典型化	(300)
附录 在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上	(312)
——访丁振海	
后记	(317)

为什么人的问题依然是根本问题

——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已经发表三十九周年了。在漫长的岁月里，它经受了各种考验，穿过了历史的风雨，至今依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辉。正象不能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一样，《讲话》的一些个别提法和结论，当然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得到完善和补充。但是，《讲话》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根据中国革命的经验加以发展的一系列无产阶级文艺的根本原则，却是历久而常青的。任何贬低和否定这部不朽著作的议论和做法都是错误的。

《讲话》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文献，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块光彩夺目的理论丰碑。它提出并解决了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道路上的许多理论和政策上的问题，诸如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生活、普及与提高、思想与创作、歌颂与暴露、动机与效果、继承与革新、文艺批评的标准、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等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所有这些“问题的中心”，却是一个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毛泽东同志最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历史现象和现实矛盾面前抓住主要矛盾，突出重点，推动全盘，从

而促使整个问题得以顺利解决。抓住文艺为什么人这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明确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是工农兵）服务的方向，找出实现这个方向的唯一正确途径——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这就是《讲话》在无产阶级文艺发展史上所做出的最重大贡献。

文艺与人民的关系问题，亦即文艺对人民的态度如何，是衡量古今中外任何作家、作品的重要尺度。从屈原的“哀民生之多艰”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从《水浒传》所揭示的“官逼民反”的历史性主题到《红楼梦》对于封建社会的叛逆者和被压迫奴隶的歌颂与同情，都证明了这个真理。但是，对于无产阶级作家来说，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却发生了质的飞跃：这就是不能象过去时代的进步作家那样，最多只是满足于对于受苦受难的下层人民的怜悯和同情，而是必须使自己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来一个根本的变化，成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忠实儿子和勇敢战士，把人民的思想、感情、理想、追求化为自己的世界观和艺术作品的内在血肉，以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真理光辉照彻艺术创造的每个环节和全部过程，从而使自己的创作真正为人民大众所需要、所利用，起到“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的历史作用。

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这是列宁在一九〇五年写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这部著作中首先提出的。但是，怎样才能实现列宁提出的这个要求呢？也就是说，实现这个伟大目标的切实途径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从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加以解决的。在《讲话》中，毛泽东同志丰富和发展了列宁所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针对“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和延安文艺

界存在的诸多矛盾和问题，非常及时而又异常深刻地把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归结为“问题的中心”，而解决这个中心问题的关键就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必须进行思想感情的改造，具体的道路就是深入工农兵、深入实际斗争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新的群众的时代相结合”。

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这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原则。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或历史时期，这个根本方向和原则又会具有自己特定的时代内容和具体特点。三十九年前，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是与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建立一个新中国的时代中心内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新中国成立之后，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就不能不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社会主义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文艺发展的根本方向。

《讲话》发表以来的解放区文艺和新中国革命文艺事业所出现的崭新面貌和取得的辉煌成就充分证明，毛泽东同志所指明的发展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而我们在前进途中所发生的一些挫折和失误，无论是来自“左”的方面，还是来自右的方面，都是违背毛泽东同志《讲话》的精神的。在“四人帮”猖狂作乱的十年间，他们年年“纪念”《讲话》，实则年年玷污《讲话》，以最堂皇的名义从事最见不得人的勾当。他们在文艺界炮制和推行的，是一条反党、反人民，与广大文艺工作者相敌对的反动路线，对新中国的文艺事业造成了难以估量的历史性灾难。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如脱秋肃而入于春温，呈现了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被党中央誉为“很有成绩的部门之一”。新时期文学艺术发展的一个最突出特点，就是一扫“四人帮”以“瞒”和“骗”为主要特征的虚伪文艺、阴谋文艺，恢复并加强了文艺和人民生活的密切联系。近年来小说、戏剧、电影、诗歌等文学体裁以及美术、音乐、舞蹈等各门类艺术所以取得显著成绩，所以得到群众的喜爱和赞赏，就因为它们通过对于人民生活的真实描绘，表达了广大群众的思想、感情、愿望和要求。凡是扎根于生活，扎根于群众，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帮助群众推动生活前进的，这就是人民的文艺，就不能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而那些一味地沉醉于自我表现、自我扩张，从思想感情上冷淡、疏远人民群众的作品，也就理所当然地受到群众的冷淡和疏远。人民的文艺是最有力量、最有前途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唯一正确的方向和道路。

当我们在充分肯定几年来文艺创作所取得的显著成绩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在前进过程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我们的文艺创作，无论从思想内容、艺术质量和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方面，都还远远不能适应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人民群众的需要。通过血肉饱满的人物形象和生动感人的艺术画面，真实而深刻地反映出新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的沸腾生活和忘我斗争的作品实在太少了。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四化创业者的形象，至今仍是文艺创作的薄弱环节。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少数描写“伤痕”和揭露社会弊端的作品，色调过于灰暗，甚至散发出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气息。一窝蜂、赶浪头、生编硬造、“戏不够、爱情凑”、格调不高、“新瓶装旧酒”等现象，也是近两年来文艺创作存在的明显缺点。这些问题的出现，尽管有着复杂的

社会背景和思想原因，但是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问题却仍然是“问题的中心”所在。

近年来，出现了这样一种耐人寻味的创作趋向：有一些青年作家，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就因写出了深沉控诉林彪、“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行，反映人民在十年动乱期间悲欢离合的成功之作而蜚声文坛。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一篇篇新作在技巧上或有上进，但作品的时代气息、生活热情和社会作用却日渐减弱。究其原因，就不能不看到，这些作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沦为“臭老九”的受迫害境地，他们的思想感情和生活遭遇同广大人民有了相通之处，这是后来能够在自己的作品中真实地反映出人民的疾苦和命运、愿望和呼声的决定性因素。然而，时代的车轮在飞速转动着：当广大人民已经投身于史诗般的四化建设的宏伟事业之中，热烈企盼着我们的作家能够燃烧起新的创作激情，用崭新的笔墨展现出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新场面时，我们的有些作家却由于种种原因，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新时期的人民群众，对新的生活、新的战斗、新的人物不熟不懂，显得陌生，甚至有人还甘愿使自己的作品迎合非常狭小的“读者群”。很明显，如果不能较快地改变这种不相适应的状况，是很难使自己的创作跟上时代的步伐的。

当然，我们在提出这种希望时，并不是不顾作家的具体的主客观条件，千篇一律地要求他们都去反映四化建设本身。题材、主题、人物、风格的多样化是永远需要的。无论是天上地下、中外古今、歌颂暴露、友谊爱情……都可以进入作家的视野之内，成为他们选材和描写的对象。但是，不论是选择什么样的题材、主题、人物加以表现，都应该使自己的作品给人民

以信念和力量，有助于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健康的审美情趣。这种要求是并不过分的。

然而，事实上，不仅在文艺创作上存在着一些不符合人民需要的情形，而且在文艺思想上，也有人对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表示了异议。有的说：“艺术的目的就在于艺术本身。”也有的说：“文艺就是文艺，为什么一定要为什么服务？”还有的说：“创作，就是作者的主观的向外反射。”有的甚至把毛泽东同志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说成是束缚创作的“框框”，等等。当然，持这类明显的错误观点的人毕竟是极少数。目前，更为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同志是在文艺“创新”的讨论过程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文艺与人民生活的关系等根本问题的不正确理解。

近年来，文艺界就小说创作中的意识流表现手法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本来，意识流作为一种表现手法，它的某些有用因素当然可以为我们的创作所吸收，有的作家的创作在这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有的同志在探讨意识流的手法和文学的创新时，却实际上提出了牵涉到文艺的根本方向的重大问题，认为“我们所做的艺术创新与探求，不可能为某些同志所接受，但我们宁可创作为一千人所理解的阳春白雪，也不愿为八亿的下里巴人去创作”。很明显，这样的“创新”和“探求”，暴露了提出者与广大人民在思想感情上的巨大差距，反映了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在他们之中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所谓“不愿为八亿的下里巴人去创作”，这样的思想境界不仅与社会主义作家的称号不相称，甚至也落在历史上许多具有进步倾向的作家的后面。连黑格尔都说过这样的话：“艺术不是为一小撮有文化修养的关在一个小圈子里的学者，而是为全国

的人民大众。”我们的社会主义时代的作家，又怎能心安理得地为“一千人”构筑艺术之宫，却把八亿人民拒之于宫门之外呢？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还割裂了普及与提高的辩证关系。普及的作品固然有待于不断提高，但在任何时候，普及都是提高的基础，没有普及就不会有提高。在当今中国，脱离八亿“下里巴人”的所谓提高，实际上就是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深刻批评过的关门提高，这种专为“一千人”理解、欣赏的“阳春白雪”，只能是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毫无内容、毫无生气的空中楼阁，是不可能成为带动整个文艺事业发展的“文艺的精华”的。

与这种观点相呼应，在讨论诗歌创新问题时，则“崛起”了一种“新的美学原则”。它的中心论点是宣称诗歌创作是诗人的“自我表现”；而“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物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的场景”。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则，“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但是，按照这种“新的美学原则”，文学创作竟然回避了自我以外的社会生活，这就从根本上离开了文艺创作的唯物主义基础。当然，作家在反映社会生活时，并不是机械地照像，而是要通过自己“头脑”的能动作用，通过自己的创作个性反映出来。因此，从酝酿、构思开始直至作品的完成，都不能不浸透着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打上作家“自我”的深刻印记。但是，这和作家表现社会生活的真实过程是主客观的统一，并不是互相割裂和绝对对立的。作为社会主义文艺范畴的“自我”

的价值，固然表现着作品中人物的思想感情同作者自己思想感情的内在的一致，表现着作者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感情方式，然而它归根到底却不能不取决于在何种程度上以个性化的形式包含着具有广阔社会容量的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在抒情诗的创作中，“自我”的色彩自然要比叙事作品来得强烈，即使如此，诗人的主观感情也不能与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相游离，这个“自我”，如果不能与自己的时代和人民的情绪息息相通，不能从人民的“丰功伟绩”、“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中汲取诗情，而仅仅是满足于表现自我的琐碎欲望，那么，这样的诗人注定是不会有出息的。连资产阶级美学家泰纳都看到：“一个孤独的人的力量永远是薄弱的，作品也不会高明。”古往今来的文学创作都可以证明：包括抒情性作品在内的任何文学作品，只有在人民生活的沃土里扎下深根，才能“绿叶成荫子满枝”。舍此，只能导致艺术之树的枯萎败落。西方现代某些文学流派的没落就是这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前车之鉴。

这种“新的美学原则”，其哲学基础是把个人置于社会之上。作者也觉察到：“表面上是一种美学原则的分歧，实质上是人的价值标准的分歧。在年轻的革新者看来，个人在社会中应该有一种更高的地位，既然是人创造了社会，就不应该以社会的利益否定个人的利益”。是的，随着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程度的提高，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必然随之提高。社会主义并不否定个人利益的存在，而是坚持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一致性。但是，个人的利益应该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应当随时准备牺牲个人的利益，必要时以至于自己的生命。所谓“新的美学原则”，却完全回避了个人应当对社会、对国家、对人民承担必要的义务和责任，把个人摆到了比社会和人民

“更高的地位”。

把文学当成党和人民的事业，还是当成个人的事业，是能否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关键所在。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所说：“在今天，坚持个人主义的小资产阶级立场的作家是不可能真正地为革命的工农兵群众服务的”。既然“新的美学原则”以个人为出发点，把个人的价值标准看得高于一切，当然也就不能正确回答文艺应当为什么人服务这个根本问题、原则问题了。

近期来，文艺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中发生的这些问题启示我们：不仅在三十九年前的延安，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似乎是已经解决了”，“其实不然”，在一些文艺工作者的“情绪中”、“作品中”、“行动中”都“不免或多或少地发生和群众的需要不相符合，和实际斗争的需要不相符合的情形”，即使对我们今天的文艺界说来，也是不乏针对性的。

三十九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曾经尖锐指出，延安文艺界的许多同志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因此，不少人的思想感情、生活方式都显得和新的群众的时代不相适应，为了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以完成时代所赋予的“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必须解决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问题，解决作家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学习问题，等等。今天，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

明。毫无疑问，在完成新时期伟大历史任务的过程中，文学艺术是大有作为的，确实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四年来，我们的文学艺术确实为自己的新时期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低估和抹煞。但是，又必须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文学艺术还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问题的症结和关键，依然是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实现文艺工作者和新时期的人民群众相结合。事情很明白，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如果不是努力学习马列、学习社会，和新时期的人民群众相结合，在当前新旧交错、新旧交替、各种社会 and 思想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就不能正确地认识时代的本质内容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就不能描绘出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向四化进军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就不能塑造出深刻感人的社会主义新人和四化创业者的光彩形象，就不能肩负起“灵魂工程师”的神圣职责，给人们以精神和道德的力量。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辞》中反复强调和深刻阐明的，也正是文艺和新时期的人民相结合的问题：“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就在于他们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自觉地在人民的生活中汲取素材、主题、情节、语言、诗情和画意，用人民创造历史的奋发精神来哺育自己，这就是我们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兴旺发达的根本道路。”《祝辞》所指出的这条“根本道路”，和《讲话》所确定的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文艺工作者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方向和道路是一脉相承的。

三十九年前，毛泽东同志在《讲话》结束时豪迈地指出，只要坚持文艺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服务的正确方向，就“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作品，一定

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历史已经实现了毛泽东同志的预言。今天，只要我们继续坚持这个正确方向，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更加光辉的“新阶段”也就一定会到来！

1981年4月